

全面抗战时期四川蚕丝业变迁及历史作用

吴 静

(成都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610041)

摘 要:四川蚕丝业历史悠久,清末逐渐发达,仅次于浙江、广东等省。20世纪30年代初,由于蚕种不良、缂丝方法墨守成规和海外丝价低落等内外因素,四川蚕丝业一蹶不振。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江浙、广东等省相继沦陷,给予四川蚕丝业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加之四川省府的扶持与管制,促使四川蚕丝业快速发展。利用四川档案馆馆藏档案对四川蚕丝业在全国抗战前后的发展态势作全景式描述与论证,梳理了政府作为与表现,分析了四川丝业有限公司营业状况,总结了四川蚕丝业在全面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作用。

关键词:抗战时期;四川蚕丝业;抗战建国

中图分类号:F1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356(2020)07-0008-05

关于抗战时期四川蚕丝业,学界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就目前研究情况来看,孙先知《近百年(1895—1994)四川蚕丝业》(《四川丝绸》,1997年2期)因研究时段跨度较长,从19世纪末至1994年,对抗战时期蚕丝业仅作简要介绍,并未系统全面地展开。胡祉牲《抗战时期的四川蚕业》(《四川丝绸》,1995年4期)着重探讨四川蚕丝业战时发展整体状况。赵国壮《从丝业融资看抗战时期后方蚕丝业的发展——基于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活动的考察(1938—1945)》(《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年3期)以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为例,考察其融资、经营活动,从行业融资角度来窥视战时后方蚕丝业发展状况,认为经济统制与后方蚕丝业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契合,金融业与后方蚕丝业发展密切关联,蚕丝行业资本构成不合理^[1]。李皇凰《经济统制政策视野下的四川丝业公司(1936—1946)》(西南大学,2019)、李鹏鑫《近代重庆地区蚕丝生产与销售研究(1891—1937)》(重庆师范大学,2018)、黎建军《尹良莹与民国四川省蚕桑改良(1936—1949)》(四川师范大学,2013)、钟华英《“从繁荣到衰败”:民国四川蚕丝业的演进历程——以南充为例》(四川大学,2005)4篇硕士论文从不同视角围绕四川丝业公司、四川蚕桑改良场、重庆和南充蚕丝业等论题进行论述,对探讨战时四川蚕丝业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本文在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四川省档案馆馆藏档案对四川

蚕丝业在全面抗战前后的发展态势作全景式描述与论证,梳理政府作为与表现,分析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状况,总结四川蚕丝业在全面抗战这一特殊时期的作用。

1 全面抗战之前四川蚕丝业的衰退

四川向来以产丝出名,清末逐渐发达,1927年达到繁盛。全川产丝量总额约为47000担,总值约为2600万元^[2],多数销往国外。粗丝一部分供应国内丝织厂,一部分销往缅甸、越南。细丝则大部分都从上海外销欧美。

根据20世纪20年代英国驻川领事霍洗调查,川丝品种一般(土蚕且只有春蚕、土丝),不及江浙丝优良;四川蚕丝业厂商零星分散,资力薄弱;川丝制造技术墨守成规。1929~1933年间,海外丝价暴跌,全国丝业无不受其影响。四川省内11家铁机丝厂相继倒闭,川丝产量迅速降低。与此同时,农村经济大受损害。茧价低廉,地价又高,植桑育蚕无利可图,蚕农丧失育蚕兴趣,纷纷放弃种植桑株,转行他业,四川蚕丝业元气大伤,同业形势岌岌可危。

为了整顿四川蚕丝业,免除争取原料、竞售成品的弊端,1933年冬四川善后督办总署设立川丝整理委员会。川丝整理委员会集合嘉定、三台、南充、重庆等地11家铁机丝厂,联合组成大华生丝贸易公司,统一经营,向重庆金融界借款170万元,发行公司债120万元,缂制生丝3000余担,希望重振旗鼓。川丝整理委员会又聘请国联蚕桑专家玛利博士(意大利籍)等来川考察,商定整理川丝办法。然而,上海丝价由于日丝倾销的压迫而暴跌,销路停滞如昔,大华生丝贸易公司经

收稿日期:2019-12-31

项目基金:四川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科研重点项目(QYYJB1604)

作者简介:吴静(1978-),女,汉族,博士,研究方向:专门史,E-mail:408585869@qq.com。

营不善,导致四川蚕丝业濒于破产,农村经济遭受严重打击。鉴于四川蚕丝业衰退的情形,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在巴县蔡家场设立四川蚕桑指导所,在三台设立指导分所,配发改良蚕种,指导农民育蚕,“为应用科学方法、改进四川蚕业之始”^[3]。结果当年的蚕丝收量增加一倍。施复亮认为,“此为川丝生产之一转机”^[4],奠定川丝推广改良的扎实基础。

从四川局势来看,1933年“二刘大战”结束,刘湘彻底击败刘文辉,统一四川。至此,持续20余年的四川军阀混战的局面结束了。政局的稳定为四川蚕丝业的复兴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鉴于蚕丝业衰败危机,四川省政府试图整顿并改进。第一,1936年四川省建设厅创设四川省蚕丝改良场(1938年改组为蚕丝试验场,隶属于四川省农业改进所),作为负责全省蚕丝改进的组织机构。第二,从江浙两省购进大批改良蚕种桑苗,免费发给农民。成立省内蚕种制造场,制造改良蚕种以满足各方需要,提高川丝品质。第三,治理全川蚕丝业。四川省府严令发种各县认真清查,“凡私购改良种茧者,得将其种茧没收”^[5],特准许将没收茧价的60%奖励给告发人。第四,国家资本开始干预四川蚕丝业。1935年秋四川省建设厅接收大华生丝贸易公司,并集资20万元组织四川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尝试改良白丝,提高川丝品质,减轻生产成本,奠定四川蚕丝业基础。1936年,四川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在重庆、南充各开设缫丝厂1所,购买改良蚕茧,缫制改良丝500余担。虽然数量极其微小,但对此后川丝的发展大有裨益。1937年川丝输出量达4297公担,约占全国生丝出口量10%,对比1936年大有增加,四川蚕丝业渐有起色。

2 全面抗战时期四川蚕丝业的发展

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江浙、广东等相继沦陷。这一时期,全国所存主要产区区域,比较完整的可以说仅有四川省。当时全国及同盟国各方对生丝需求量大,全靠四川供给。毫无疑问,这是四川蚕丝业发展“千载一时之良机”。

惟其如此,省内原已停歇的10余家丝厂先后恢复营业,各地蚕农开始积极生产。但是四川省府早有统制改良蚕丝的计划,着手管制民间制缫,训令复业厂商以资产作股加入四川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1937年将该公司扩大改组为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丝公司)。1938年,四川省府颁布《四川省政府管理蚕丝

业办法大纲》(13条),规定改良蚕种由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蚕丝试验场制造,发给农民饲养;丝公司独家收买改良蚕茧,独家缫制及运销改良蚕丝,成为四川省府实施川丝外销管制的基础。为了加强丝公司统制力量,建设厅将下辖19家蚕种制造厂以投资方式并入该公司,由该公司负责经营。如此一来,所有川丝制销的事宜,统由丝公司独家负责经营,而外销川丝的整个产销过程也由过去的自由贸易方式进而改为政府统制。

为了挽救蚕丝业减产危机,1938年四川省府设立四川省蚕业推广委员会,隶属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该委员会分别在川东、川北设立推广区,强化改良蚕种及桑苗的推广工作,指导蚕农栽桑养蚕,谋求川丝生产发展。但是,1938年川丝输出额依然较小,仅400余公担,相较1929年输出额17000余公担,可说是凤毛麟角。秋季,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妇女指导委员会生产事业组在乐山成立蚕丝实验区,提高产量与改进技术,但开办之初并无明显起色。

1939年,四川省府除继续改良蚕丝之外,还设立土茧土丝管理委员会,负责土茧土丝的生产运销等事宜。为了进一步加强对于改良蚕丝的统制,四川省府修正了《四川省政府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大纲要点强调:(1)改革全省推进蚕丝业的组织机构。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蚕丝试验场主持全省蚕桑品种的改进及繁殖、育蚕栽桑技术的研究和蚕桑技术人员的训练等事项。四川省蚕业推广委员会隶属于四川省农业改进所,负责推广改良蚕种饲养、桑苗栽培及养蚕技术指导。(2)授权丝公司独家制造改良蚕种、独家收买改良蚕茧、独家缫丝及运销改良蚕丝等经营事项。土茧允许自由购买。(3)改良蚕种仍然由丝公司赠送,茧价由省府规定。(4)省府对公司商股,只保息不保亏。在此项办法引领下,技术与推广分别交由2个机关主持,而同隶属于四川省农业改进所。全川改良蚕种的制造、收购和缫制改良生丝等均划归丝公司独家经营。加上由于国外订货量有所增加,川丝外销渐有起色,1939年出口1209公担,相较1938年度增加600余公担。

1940年,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迁到四川。贸易委员会与丝公司立场不同、主张各异,制定了与《四川省政府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脱节的办法,旨在掌控川丝。在此情形下,各方都不再遵循省府公布的改良茧价,而是提价竞争,使得原有格局被打破。与此同时,蚕种费超过省府预算之外,改由中央、省府和丝公司三方负担。到了秋季收取蚕种成本每张2元,除由中央、省府

分担,丝公司放弃独家收购之权,允许商人自理收购。至此,省府放任,不再公布茧价,而是随市议价。但是因为物价上涨过快,养蚕制丝成本猛增,丝价追赶不及,加上政府没有及时扶助蚕农,导致产量下跌。1940年外销生丝出口1 269公担,与上年输出量相比变化不大。

1941年,大后方物价飞涨,生产成本增加,川丝生产萎靡不振。丝公司虽发种30万张,但因蚕茧价格暴跌,蚕农不愿饲养蚕种,全年川丝输出总额仅仅1 000公担,“成绩之劣,竟为历所未有”。内销丝虽因战时人口集中于大后方,需求剧增,但产量极其有限。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在此情形下,日丝对美国的出口停止,英美军用生丝需求激增,我国生丝外销由衰转盛,国内蚕丝产量难以满足市场需求。有鉴于此,政府当局1942年成立四川省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督导川丝增产。

为了管制战时各省特产产销,换取外汇,1943年行政院通过《财政部贸易委员会全国生丝统购统销暂行办法》,规定桐油、猪鬃、生丝、茶业等特产一律由政府实施统制购销。这种统制办法将蚕丝置于统制之下,与《四川省政府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比较,有几点不同:第一,四川省府统制的是蚕茧,贸易委员会统制的是生丝。生丝购销部分由财政部所属复兴公司独家经营,关于茧丝生产与缫制,四川省府委派给乐山蚕丝实验区和丝公司分别负责,不准许商人自由买卖。民间存丝必须据实报请登记,同时颁行内地转运证,凡800公斤以上,都必须领取转运证才准许运销出境。第二,四川省府统制蚕茧,只统制改良白茧而放任土茧;贸易委员会统制生丝,改良丝、土丝都在其中。第三,四川省府担任蚕种成本与外销丝的保息保亏,而贸易委员会采用评价办法,使得缫制外销丝的厂商毫无保障,一方面不得不走竞买原料的途径,另一方面又怀着成品有被限价强迫提取的恐惧。由此不难看出,四川蚕丝业的发展前途取决于政府当局政策运用良否。但是,政府实施这种战时统制购销政策的重心,原就是为了换取外汇、交换盟国物资,对于蚕农实际利益可以说是漠不关心。这就导致收购官价往往低于生产成本,而且捐税繁重、收购手续苛刻繁琐,结果造成蚕农纷纷砍桑停业,四川蚕丝业更加不可收拾,极度减产^[6]。

应该指出,四川蚕丝业在全面抗战时期一跃而居领导地位,原应有着许多发展机会,可是每年产量增进

不大,反而每况愈下;外销未增,内销不易;蚕农生活日趋艰苦,厂商经营惨淡。

3 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营业分析

为了防止利权外溢,四川省政府拨款70万元,连同大华生丝公司11个厂及建设厅筹办的桑园地亩等,加入四川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并将该公司扩大改组为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丝公司内设制种、缫丝两部,分别办理蚕种制造、生丝缫制等业务。

总体来看,全面抗战时期丝公司营业情况如下:

第一,丝公司规模扩大。截至1941年收并添配缫丝厂10所,扩大及新建制种场11所,敷设茧炕800余座,推广蚕丝区20余县,桑园面积2 000余亩,举办蚕丝训练班5所,培养学员千余人^[6]。丝公司经营区域主要为川东区的巴县、江北、璧山、合川,川北区的铜梁、潼南、西充、南充、南部、三台、射洪、盐亭、阆中、苍溪,川西区的梓潼、绵阳。

第二,从公司资本及股份百分比来看,丝公司因发展需要逐年增资,先后邀请经济部、农本局、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民银行及四川省金融界、蚕区地方士绅、蚕农公司职员、蚕业推广委员会全体职员加入投资。1941年,又邀请贸易委员会富华公司加入。其历年资本及股份变化,见表1^[6]。

表1 历年资本及股份变化统计

年份	股份金额 /元	四川省政府 /%	国家银行 及机关/%	商业银行 及私人股份/%
1937年	1 400 000	70		30
1938年春	2 000 000	58	15	27
1938年秋	3 000 000	30	30	40
1940年	4 000 000	22	33	45
1941年	1 200 000	14	51	35

值得注意的是股份百分比的变化。官股逐年减少,商股尤其是金融界投资逐渐增加。这充分表明丝公司日趋企业化。

第三,丝公司生产情况,以改良白茧制种量及所缫机械白丝产量(表2)为例考察。

从表2来看,育制改良蚕种1939~1940年盛极一时,制造改良丝1939年达到最高峰。这归因于政策的扶持即四川省府授权丝公司独家经营全川改良蚕种的制造、收购和缫制改良生丝等事项。然而1940~1945年丝公司产量减少,外销丝量仅以1940年2 100关担为最多。

不可否认,丝公司成立以来取得一定的进步,促进

了四川蚕丝业的发展。但是从其营业情况来看,也暴露出其缺点。

表2 改良白茧制种量及所缫机械白丝产量

年份	制造改良种 /张	改良种 百分比 /%	制造改良丝 /关担	改良丝 百分比 /%	外销丝 /关担
1936	80 000	100	640	100	
1937	121 030	151	1460	223	20
1938	532 069	665	2 645	413	760
1939	643 945	804	5 798	906	2 000
1940	733 500	916	2 000	312	2 100
1941	578 698	723	2 050	318	1 650
1942	362 500	458	1 800	281	1 200
1943	362 000	452	2 800	437	1 200
1945	300 677	375	2 302	350	600

注:以1936年生产数为基数。

首先,育制改良蚕种数量不足。1937年,该公司接收巴县惠利、盐亭光华及三台农兴3家制种场,开始自行制种。1938年,扩充制种场为10家,制种53.2万张;1939年,10家制种场64.3万余张。四川省府分析“现在每年产鲜茧47.8万担,若一律改育改良蚕种共需约200余万张,较之目前该公司制种量,约为4:1之比,该公司能否最短期内将改良蚕种制造量扩充为4倍,殊为疑问”^[7],指出丝公司人力财力难以单独完成全省增加蚕丝产量的计划。

其次,生丝产量太少。成立之初,丝公司接收前四川生丝贸易股份有限公司所属丝厂10家、缫丝车3400部;经各厂调整归并,拥有缫丝厂6家、缫丝车2858部。然而,1939年开工的缫丝厂只有5家,华兴缫丝厂未曾开工。据统计,除华兴缫丝厂之外,全省空闲丝车还有540部左右。究其原因是源头出了问题,也就是说蚕种供给不足,且丝公司独占制种业,蚕种也无法补充。另外,蚕农认为丝公司规定收购的茧价太低,往往匿茧不售,遂致收茧数量不能与发种数量相称,导致生丝成本增高、产量不能增加。从中不难发现,丝公司历年所受无形损失比较大。

再次,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四川蚕丝业的发展。根据1939年四川省政府颁布《四川省政府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严禁其他农民自由制造及买卖改良蚕种,严禁领种农民和其他缫丝纺织厂自由买卖茧丝,全省所有改良蚕茧只准售予四川丝业公司。然而丝公司无论制种还是制丝产量有限,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四川蚕丝业的发展。因此,1940年四川省府逐步将制种、缫丝业予以开放,准许民众合理经营。

总而言之,丝公司诞生于抗战的烽火硝烟中,其间

历经艰辛困苦。1937~1939年,该公司制改良种与改良丝的产量都能按照预定计划增加一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外销困难,国民政府强化管制,加大后方物价狂涨,蚕农生活困苦,使得该公司举步维艰、生产萎缩,每年生产仅能供给国内及同盟国的降落伞原料,维持省内少许织绸厂使用。

4 全面抗战时期四川蚕丝业的历史作用

回溯中国近代史,在全国产丝各省中,四川蚕丝产量仅次于江浙、广东,位居第三;在全国生丝出口贸易中,除浙江、广东两省之外,四川蚕丝几乎与江苏并驾齐驱。抗战爆发后,东北、江苏、浙江与广东等相继沦陷,所存主要蚕丝产区仅有四川省。从1938年起,四川蚕丝业快速发展,增加产量,承担供给全国及同盟国所需生丝之责。抗战胜利后,四川协助江苏、浙江等省主要蚕丝产区的复兴。由此可知,战时四川蚕丝业在全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1 换取外汇及稳定法币价值

1937年抗战军兴,苏、浙、皖、粤、鲁、鄂等省主要蚕丝区域先后沦为战区备受摧残,给整个蚕丝业带来不利影响。蚕丝出口减少,国家法币价值逐渐低落。仅有四川能够对桑苗、蚕种、缫丝和试验研究等事业积极拓展,不仅使得入川蚕丝技术人员能够各展所长,而且使得生丝产量增加,对外则直接可以换取外汇,稳定法币价值;对内则供应国内需要,充实抗战建国的力量。

4.2 增加生产富裕大后方农村

20世纪20年代四川丝厂几乎全部倒闭,蚕业衰败。农村生产较少,农民贫困,农村经济艰难。丝公司成立以后,随着公司业务的拓展,四川农业从中受益不浅。“1936年试办时,发桑种不过800张,制丝不过500担,养桑区域不过南充西充两县城。厥后每年增加,至1939年发种70万张,制丝7000余担,养桑区域达20余县之多,炕茧灶800余眼……桑农30余万担。每到春秋收茧两季,农人赴庄求售者,络绎于途,胜于赶集。乡人借贷契约,大多注明下季桑期本息归还,成为惯例。农人售茧得款,即于附近征收机关临时派驻所清缴粮税,以故桑区无欠粮。至于农人,实益尤大,盖每季收茧须以大量现钞运到农村,1936年仅数百万,1940年则数千万,1941年后数万万。”不仅桑农蚕农增加生产、增进收益,而且农村金融得以调剂,尤其是川南、川北农村以养蚕、缫丝和织绸为其重要生活。

近代著名蚕学家尹良莹评论,战时四川蚕丝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挽救农村经济的良剂”,关系着广大民众生计。反之,“任何一阶段之利益剥削过甚,或者供应偶一失调,即立起骚乱。”例如,丝公司1944年春按照复兴公司的限价在川北一带统购白茧,川北民心浮动,几乎惹起纠纷。四川省府急电增加茧价,范崇实奔赴南充、三台、阆中等地与地方绅民农工商协调,才得以平息纠纷。

4.3 供给大后方云南、贵州、西康各省蚕丝业发展所需的资料

四川蚕丝业改良较早,发展迅速,原种桑苗及其他设备较为完善。因此,除继续发展本省蚕丝业之外,供给云南、贵州、西康各省原种、普通种、桑苗、桑仔等资料,在一定程度上扶植了大后方蚕丝业。因此,四川蚕丝业一跃成为大后方蚕丝业的中心。

4.4 保存国家蚕丝业命脉

江苏、浙江各省原有蚕丝技术人员、优良原蚕种及各种珍贵设备等都是中国蚕丝业的命脉。抗战爆发后,沿海部分蚕丝厂迁到大后方,东南各省蚕丝技术人员陆续入川,参加改良蚕丝工作。1938年春秋两季自制改良蚕种53.2万张,1939年制造改良蚕种70万张。1943年,四川省外销物资增产委员会制定“蚕丝增产计划纲要”,强调训练蚕丝技术人才,指出“与川大蚕丝系、中央技专校蚕丝科联络训练高级蚕丝人才;与江苏女蚕校、南充高蚕校及其他农业学校、职业学校联络训练中下级技术人才约100名,分配各督导区、指导所、制种缫丝厂工作;更由各督导区利用蚕间之时分别开班训练蚕农500名至1000名使其技术熟练以树改进之基础。”^[8]这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近代中国蚕丝业的

“元气”。

4.5 供应军需用品

蚕丝不仅关系民用,而且关系军需,“为制造飞机降落伞、炮弹火药囊,以及手榴弹拉线等之原料”。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同盟国所需生丝仰赖中国。俄、美、英等国曾函请中国大量供给。在战时情形下,四川省蚕丝业肩负供给本国与同盟国所需生丝的重任。1943年行政院划拨蚕丝增产经费1000万元,四川省府加强蚕丝增产,增加外销物资产量,以应同盟国需要,增强抗战力量。就这个角度而言,四川蚕丝业为取得抗战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

- [1] 赵国壮.从丝业融资看抗战时期后方蚕丝业的发展——基于四川丝业股份有限公司融资活动的考察(1938—1945)[J].中国经济史研究,2016,(3):123.
- [2] 尹良莹.四川蚕业改进史[M].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
- [3] 钟崇敏,朱寿仁.四川蚕丝业产销调查报告[M].重庆:中国农民银行经济研究处,1944.
- [4] 施复亮.四川蚕丝业[M].重庆:西南水利出版社,1946.
- [5] 蚕丝业近讯[J].四川经济月刊,1937,7:31.
- [6] 林驥材.范崇实与四川丝业公司[J].新世界月刊,1946,(10):13—18.
- [7]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农改所与所属部分机构组织规程调整机构办法及蚕业推广委员会工作大纲、省府管理蚕丝业办法大纲[A].档号:民148—05—8882.
- [8] 四川省档案馆.四川省蚕丝业1943年度增产办法大纲、蚕丝业计划纲要及推销军用、外销蚕丝生产合作计划[A].档号:民115—01—1535.

Changes and Historical Functions of Sichuan Silk Industry in the Period of Anti Japanese War

WU Jing

(Chengdu Normal University, Chengdu 610041, China)

Abstract: Sichuan silk industry had a long history and gradually developed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By the early 1930s, Sichuan's silk industry had never recovered. In 1937, with the outbreak of the all-round anti Japanese war, Jiangsu, Zhejiang, Guangdong and other provinces were occupied, which gave Sichuan silk industry unprecedente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In addition to the support and control of Sichuan provincial government, Sichuan silk industry developed rapidly.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ichuan silk industry before and after the comprehensive anti Japanese war was described by using the archives of Sichuan Provincial Archives. The action and performance of government were combed. The business situation of Sichuan Silk Industry Co., Ltd. was analyzed. The role of Sichuan silk industry in the special period of the comprehensive anti Japanese war was summarized.

Key words: anti Japanese war; Sichuan silk industry; anti Japanese war and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